

中国诗歌的精神

■李少君

分,虽九死其犹未悔”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。屈原呈现出一种理想人格的典范,体现了诗歌精神的力量。

陶渊明和陈子昂是中国诗歌精神的开拓者。陶渊明不求富贵,不为五斗米折腰,安贫乐道,其《归去来辞》:“归去来兮,田园将芜胡不归?既自以心为形役,奚惆怅而独悲?……实迷途其未远,觉今是而昨非”,可谓一份坚守心中之道的宣言书,一篇大隐于市的心灵告白。陶渊明平淡冲和的后面,是其“守道”的风骨气象,因此历来被推举为士大夫精神的榜样。陈子昂则在逐逐颓靡风气盛行之时,意识到他心中看重的精神价值必须通过诗歌发声,因此提出确立诗歌正道,发出震古烁今的呐喊:“文章道弊,五百年矣。汉魏风骨,晋宋莫传”,呼唤恢复强调精神性追求的诗歌新潮,即汉魏风骨和兴寄传统。陈子昂顺应时代要求,振臂一呼,应者如云,被誉为“盛唐之音”。

中国诗歌精神两个并肩而立的代表人物是李白和杜甫。他们出现在盛唐期间,那个时候也是中国文化的青春上升期。李白自立自傲自强的性格随时见诸诗作:“虽长不满七尺,而心雄万夫”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“仰天大笑出门去,我辈岂是蓬蒿人”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,使我不得开心颜”。李白冲决罗网的自由精神,如大鹏展翅翱翔九天。他从前人广泛吸取精神力量,可以说是自由意志、浪漫主义、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集合体,所以龚自珍这么评价李白:“屈原实二,不可以并,并之以为心,自白始。儒仙侠实三,不可以合,合之以为气,又自白始也。”

杜甫则是儒家的美学代言人,杜

甫年轻时具有强大的个人主体性,“诗是吾家事”“七龄思即壮,开口咏凤凰”“读书破万卷,下笔如有神”,但经历安史之乱后,杜甫深刻体会到了百姓疾苦,跳出了个人一己之关注,将关怀撒向了广大的人间。他的境界不断升华,胸怀日益开阔,视野愈加恢弘,成为一个具有“圣人”情怀的诗人,所以历史上称之为“诗圣”。杜甫最著名的诗作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,写到自己陋室的茅草被秋风吹走,又逢风云变化,大雨淋漓,床头屋漏,长夜沾湿,一夜凄风苦雨无法入眠。但诗人没有自怨自艾,而是由自己的境遇,联想到天下千千万万的百姓也处于流离失所的命运。诗人抱着牺牲自我成全天下人的理想呼唤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!风雨不动安如山”“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,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!”这种“仁爱”思想,正是儒家精神的传承弘扬,其诗歌可谓儒家精神的最佳阐释者。

中国诗歌精神的发扬光大者是韩愈。韩愈在思想混乱的历史关头,痛恨于情欲的泛滥、修辞的奢华和异端的蛊惑,开始发起“原道”“原学”等运动,表现出自觉的修道修身,开启新的文学革命。韩愈高擎“道”之大旗,写下《原道》《师说》等著名文论。《原道》强调“道”的重要性,《师说》指出“传道”的必要性。韩愈将其“道”贯彻于其诗歌中,成为“诗言志”的践行者,也是“传道”的文学复兴运动的领袖。

将中国诗歌精神实践到底的是苏东坡。乌台诗案,苏东坡被贬黄州,但他坚持心中之“道”不变,在给友人的信中说:“吾侪虽老且穷,而道理贯心肝,忠义填骨髓,直须谈笑于生死之际。若

七彩风

歌词,看起来容易写,但要写出好词并不容易。近年来,我陆续写了200多首歌词,主要是反映部队火热生活以及官兵思想情感主题。这期间,我从模仿开始到慢慢摸出门道,逐渐积攒了一些创作体会和感悟,愿与大家交流互鉴。

深厚的生活积淀

生活是创作的源泉,没有深厚的生活积淀就难有丰厚的创作素材,难出经久流传的艺术作品。

所谓“胸藏万汇凭吞吐,笔有千钧任翕张”,说的就是厚积薄发。创作者只有做一个有心人,观察生活现象,从中汲取养分,积累素材,加以提炼,才能创作出生动形象的歌词。

我曾在驻西北的空军基层部队工作多年,对西北地区艰苦的自然环境很熟悉。胡杨、红柳、骆驼草、沙枣花等在我脑海中深深地扎下根,信手拈来就写进了歌词。如歌曲《当兵来到戈壁滩》:“当兵来到戈壁滩,一干就是十几年,营房四周沙尘弥漫,胡杨陪伴驼铃声咽,弱水映红颜,沙枣穿帘窗。同睡同吃同值班,战友情谊永相连。当兵来到戈壁滩,青春年华做奉献,训练场上摸爬滚翻,寒来暑往勤学苦练,精武又强健,奋勇争先,超越自己的极限,练好本领把敌歼……”

歌词经张延道老师谱曲后,部队官兵尤其是在戈壁滩生活工作过的同志都非常喜欢。只有对生活有所悟,有所感,歌中流淌出来的情感才真挚动人。创作者平时眼睛和心思多关注基层、关注普通官兵,写自己熟悉的生活,才能有感而发。

注重方法积累

写词首先是视角。“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各不同。”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,会得到不同的答案。视角即从什么角度切入,是站在外部世界还是内部世界,是用我、你还是他。

其次是构思。歌词写作中,构思往往是看不见、摸不着的东西,既是抽象的,也是具体的。歌词中好的构思带给人美感,能抓住听众的心。一个成功的构思,往往建立了一种格调,提升了歌词的美学品位。好的歌词要有画面感,给人生动的形象,尽量做到每一句都能构成一幅画,这样就连缀成一组画,提高歌词共情的能力。

第三是提炼主题。许多时候并不是一开始就有明确的主题,而是不断升华提炼的。

我曾在基层部队的点号工作过,一个点号就几个人,最少的仅两个兵。10多年过去了,我依然还记得那时走在路上睁不开眼睛、风沙打在脸上生疼的感觉。大西北冬季很长,时常刮风沙,见不到绿色。妈妈知道我当兵的地方条件艰苦,总是很牵挂。我就摘下胡杨叶、红柳花,随家信寄给她,告诉她点号也有春天,而且是大写的春天。后来,我把这段经历写进歌中:“我在大漠戈壁执勤,离家很远很远,妈妈听说塞外没有春天,我从哨位的胡杨采摘绿叶一片,寄回江南给妈妈一个放心的答案。我在雪域高原巡逻,离家很远很远,妈妈听说边防没有春天,我从营房的红柳采摘花儿一束,寄回江南给妈妈一幅美丽的图案。妈妈,我是您的儿子,也是祖国的战士,执勤巡逻在万里边关,用忠诚筑起一道和平的栅栏,守

谷;战友们来自全国各地,东北“小厨星”艾士充、内蒙古“开心果”兴安、云南的“高材生”赵选广……中队的每个人都曾站在大坝上眺望过远方的家乡。江班长对我说,他站在哨楼上,经常能看到低飞的苍鹰,每当看到苍鹰穿过乌云,仿佛就像带走了他的迷茫,更加坚定了坚守的心。

我将这些画面一一串起,写在纸上。熟悉的旋律配上新编的歌词竟有了别样的韵味。“哨兵目送着黄昏,消失在远方的山岭。嘹亮的军歌时常回荡在我们耳旁。那些流下的汗水永远不会被隐藏。”就在不久前,江班长放弃了去条件更好的单位,选择留在中队。我想,他一定是已经深深爱上了这里。

把我们的故事写成歌

■张世浩

活力军营

“执勤的时光,是我们的时光。左岸的清风,伴随着我们成长……”这首回荡在山间的歌,是由流行歌曲《我们的时光》改编而来,新编的词讲述了我们中队的故事。

那天,四班长江荣林找到我:“排长,我们写首歌吧。”

“写歌?这我可不行。”我有些错愕。江班长拿出吉他,弹起流行歌曲《我们的时光》。就是这首,我们把歌词一改,改成跟咱们生活相关的内容。最近,我看到的战友好像想家了,写首歌,组织大家唱一唱,提神、鼓劲。”

听他这样说,我便不再推托,答应下来。我所在的武警青海总队某执勤中队,常年担负着守卫水电站的任务,就像歌中唱的那样“这里就像与闹市隔绝的又一个世界”。战友们都说,自己是“山水间”的守望者。

改编歌词时,中队日常生活的点滴浮现在我眼前:青海的白天很长,直到晚上八九点钟,哨兵才目送夕阳落入山

听见心泉的叮咚声

■苏俊

护着妈妈和锦绣河山。”

出新,方能出彩

歌词是踏着生活的节拍,伴着音乐的旋律,从笔端流淌出来的心灵之泉。歌词难写,难在于平实浅显中有深意,难在写人所未写。

创新是一切艺术创作的生命所在,每一首歌词都应具有艺术的独创性,表达独到见解,既不重复自己,也不重复他人。不重复自己,要求每一次创作,都是一次全新的体验;不重复他人,要求作品有独特的个性色彩,表达独特感受。

创作歌词时,还要准确把握时代脉搏,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。在视野上尽力去拓宽、放远,捕捉崭新的角度;在语言上竭力去挖掘、创新,避开同题材作品的词汇雷同,独辟蹊径、寻找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感觉。

有让人记得住的“词眼”

歌词中的“词眼”也被称之为“流行句”或“记忆点”。它可以是歌名,也可以在主歌或副歌中出现,当然副歌是出现“词眼”最多的地方。因为副歌有对比和重复的双重功能,可以起到加深记忆、强化感染力的作用。许多广为流传的歌曲,让人印象深刻的语言往往是副歌中多次出现的“词眼”。

要求一首歌词字字珠玑,很难做到。即使做到了,效果也未必就好,语言的饱和度太高,往往冲淡了整体印象,既不利于记忆,也使作曲家难以把握重点。

“词眼”需要仔细琢磨,用心寻找,其间要有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精神。比如,宋祁《玉楼春·春景》中的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,“闹”字写出了花开得热烈,阳光下的灼灼其华。所谓一字,便尽显风流。“词眼”既可以是日常用语,也可以升华生活表象,提取哲理内涵。

歌词三分写、七分磨,工匠精神出细活。歌词写出来之后不要急于谱曲、发表。我刚开始写词时就出现过这样的状况:初稿出来后踌躇满志,越看越满意,立刻交给谱曲、演唱、发表……等过段时间再看,才发现有不满意之处,这句话要是这么说不不是更出彩?但是,改不了啦。所以,歌词一定要反复推敲,要像酿酒那样沉淀,甚至窖藏数年。

艺境

中国诗歌精神的源头就是“诗言志”。“诗言志”主张倡导一种价值、一种精神,屈原、陶渊明、陈子昂、李白、杜甫、韩愈、苏东坡、文天祥等都是代表人物。他们高扬“诗言志”的传统,建构起中国诗歌的精神脉络。

“诗言志”是中国诗歌的最高标准和黄金律令。何谓“志”?许慎《说文解字》曰:“志,意也。从心,之声”,志可以理解为意愿、意向、意义、思想等含义,总之,属于精神范畴。也有把情志即情感和思想统一起来理解的,如唐孔颖达称,“在己为情,情动为志,情志一也”,但我以为,相对而言,情是个人性的,志包含他者及社会的视角。比如,情是个人发动,爱就有指向,需要对象,需要接纳。志更具公共性因素。所以,我觉得“诗言志”,就是表达情怀、理想和志向,就是倡导价值、弘扬精神。

“诗言志”,诗来源于情感,但应该超越于一般情感。超越,建立在情感之基础上。诗是文字的最高形式,不能等同于一般的情感抒发、情绪宣泄,诗应该有更高的使命:诗言志。精神的源头是情感,但情感不加控制,就流于欲望本能;情感经过疏导、提升,就可能转换为道或者理,并可能最终转化为精神。

中国诗歌精神的最早确立者是屈原。他追求灵魂的高贵和人格的完美,为了理想拒绝同流合污,宁愿舍生取义,其诗歌所传递的精神,显现强大的人格魅力和感染力。屈原的《离骚》最能体现这种高贵而昂扬的诗歌精神和他坚持理想的决心,“亦余心之所善



神枪手

■摄影 陶磊

这幅作品拍摄的是第82集团军某旅实弹射击考核后,战友们纷纷为打出满分成绩的刘倩鼓掌祝贺的场景。面对战友们的鼓励,刘倩难掩心中喜悦,绽放出甜美又羞涩的笑容。拍摄者利用高速快门定格下这美好难忘的时刻。作品展现了当代女兵活泼爽朗、青春昂扬的精神风貌。

令人崇敬之情油然而生。步入展厅,历史的厚重扑面而来。纪念馆展陈以“开天辟地——中国共产党诞生”这一历史事件为核心,以党的“一大”为重点,多角度展示了“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”“中国共产党成立”和“十三位代表生平事迹介绍”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伟大成就等主题内容,讲述自鸦片战争之后,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救亡图存不惜抛头颅、洒热血的悲壮史实,介绍了中共“一大”代表早期的革命活动以及“一大”会议情况。展览以大量的史实再次证明了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”的朴素真理……站在这些泛黄的照片面前,我们仰望熠熠生辉的历史天空,眼前仿佛浮现出百年前,那些脚步匆匆的身影;耳畔响起了“红船”中传出的低沉却石破天惊的声音!

南湖不大,却因为历史的选择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心中“圣地”;“红船”虽小,却因为时代的机遇承载着民族复兴的重任,乘风破浪驶过百年征途。沉思之中,已近中午,我们正欲结束南湖之行,偶遇某部官兵在“红船”旁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,绵绵细雨打湿了军装,展开的党旗却愈加鲜艳夺目。

烟雨迷濛访旧踪

■唐婧瑞 洪庆任

“仿古街”为中心,分南、北两园。北园西侧以中轴线对称,四进庭院式风格,东侧为自由开放式园林布局。园内建有碑廊,许多碑刻出自历代著名的书画大家之手,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和艺术欣赏价值。其中,唐代吴道子手绘“出海观音”石刻,神态自然,栩栩如生;明代书画家董其昌手书“嘉兴府学重修明伦堂记”碑记共1100余字,行笔流畅,风格逸秀,可谓园中瑰宝。

从揽秀园出来,乘船登上湖心岛,丝丝凉意沁人心田,举目四望,青山绿水嫣然朦胧一片,仿佛置身仙境般。透过雨隙微光,山腰间云雾飘渺,但见“烟雨楼”已在眼前。此楼因唐朝诗人杜牧“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”的诗意而得名,楼前檐悬“烟雨楼”匾额为中共“一大”代表董必武所题。董老1964年重访南湖时曾挥毫题诗:“革命声传画舫中,诞生共产党庆工农。重来正值清明节,烟雨迷濛访旧踪。”

登楼远眺,湖光山色间,“红船”静

立湖面,与烟雨楼遥遥相望。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,走近“红船”细细瞻仰,不由得感慨万千。这是一艘江南水乡常见的单夹弄丝网船,内有前舱、中舱、后舱和后舱,右边有一条夹弄通道。其中,前舱设有凉棚,中舱有方桌,桌上放着茶具,四周放置凳椅;后舱设有床榻,供休息用;后舱则置有橱柜等物,可用来做饭……

1921年夏,中共“一大”在上海召开。就在代表们讨论党的纲领和工作决议的关键时刻,突然遭遇搜查,会议被迫中止。中共“一大”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是嘉兴人,在她的提议下,会场由上海转移到了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继续召开。就这样,历史选择了嘉兴南湖,“红船”有幸承载起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,指引着中国这艘巨轮劈波斩浪,走过百年苦难辉煌。

离“红船”不远处是南湖革命纪念馆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悬于纪念馆正中央的中国共产党党旗,庄严肃穆,

红色足迹

那天,我们从上海虹桥车站出发,大约半个小时后抵达嘉兴南站,顾不上与前来接站的战友寒暄,便直奔南湖而去。

南湖位于嘉兴市东南部,旧称陆涪池,又名马场湖。京杭大运河嘉兴段主流经过北丽桥,城北桥至西丽桥水分两股,一股向东流入西南湖,一股向西汇入运河。嘉兴南湖,即由运河各渠汇流而成,上承长水塘和海盐塘,下泄于平湖塘和长纤塘,南湖四周地势低平、河港纵横。

时值梅雨时节,烟雨蒙蒙之中,南湖别有一番江南诗韵。漫步湖边,穿行小道,首先步入南湖西侧的揽秀园。战友介绍说,揽秀园之名出于《浙江通志》“秀水东会沪淞,西控语溪,襟带具区,独揽其秀”之语。揽秀园以“文星桥”